

中华 慈善事业

思想、实践与演进

现代慈善公益事业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衡量着一个民族的胸襟气度和文明程度，维系着一个社会的人间道义和精神认同。

Zhonghua Cishan Shi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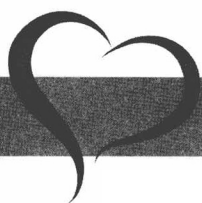
莫文秀、邹平、宋立英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华 慈善事业

思想、实践与演进

Zhonghua Cishan Shiy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慈善事业:思想、实践与演进/莫文秀,邹平,宋立英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01-009542-4

I. ①中… II. ①莫… ②邹… ③宋… III. ①慈善事业-历史-中国 IV.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329 号

中华慈善事业:思想、实践与演进

ZHONGHUA CISHAN SHIYE;SIXIANG,SHIJIAN YU YANJIN

莫文秀 邹平 宋立英 著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张旭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65289539

印刷: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358 千字

书号:ISBN 978-7-01-009542-4

定价:48.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慈善的力量（自序）

我曾从事妇女儿童工作二十多年，其中最美好、最难忘、最珍贵的时光都和慈善公益事业紧紧连在一起。回首过去的岁月，我和许多爱心人士一道，无时无刻不感受着慈善的力量：犹记得邓六金大姐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奔走呼吁，为贫困孩子募集善款、传递关爱；犹记得“母亲水窖”等慈善工程凝聚千万人的爱心，给西部地区的百姓引来生命之泉；犹记得每一次参加慈善活动时的情感升华、心灵净化，以及刻骨铭心的灵魂震颤……

人类追求完美与和谐的天性与希冀，筑就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慈善的力量透射出人性醇厚与舍己助人的高尚品格，展现出人类道德的升华和完善。慈善的本质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对弱势群体的挂念与扶助，体现了超越一切功利考量的无私奉献精神。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女士所说：“我们不是伟大的人，无法做出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一颗伟大的心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践行慈善，不管贫富，无论老少，只要有心为之，就能随时躬行。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儒家言“仁者爱人”，道家谓“损有余，补不足”，墨家讲“兼爱”，佛家云“慈悲为怀”，莫不与慈善思想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受现代文明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以扶贫济困、奉献爱心为宗旨的现代慈善公益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慈善事业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发展慈善事业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之中，第一次明确了慈善事业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第一次界定了慈善事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12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出席中华慈善

大会的代表时进一步指出，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崇高事业。他希望海内外社会团体、各类企业和各界人士进一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热情参与慈善活动，向需要帮助的人们奉献更多的关爱。这些重要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现代慈善公益事业不仅是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尺。

抗震救灾的伟大成就将中国慈善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在 2008 年抗击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和 2010 年抗击青海玉树地震灾害中，慈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捐赠行动，为灾区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实践证明，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符合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健全小康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是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时代之举。

多年的慈善公益事业中，我一直铭记着慕华大姐、珮云大姐、秀莲大姐的教诲，致力于将慈善公益事业的有益经验升华为理性认识，不断探索和认识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规律，用于指导工作实际。随着工作和思考的不断深入，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也逐渐丰富。我感觉到，梳理中华民族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对慈善公益事业进行从理念到实践的探研，不仅正当其时，而且很有意义。汶川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给我增添了新的力量，我和邹平、宋立英两位同志开始着手撰写《中华慈善事业：思想、实践与演进》一书。2008 年 9 月，我的工作有所变动，但对本书的创作仍保持极大的热情。本书三易其稿，希望表达这样一种理性认识：现代慈善公益事业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衡量着一个民族的胸襟气度和文明程度，维系着一个社会的人间道义和精神认同，需要各方面的热心支持和鼎力襄助。我们始终相信，未来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强国，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大爱无疆的文明大国。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正如英国诗人莎士比亚所说：“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露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愿慈善如甘露润泽中华、福佑民生，融入我们每个人的血脉心灵；也愿将此书奉献给富有爱心的人们，让我们在爱与被爱、帮助与被帮助的过程

中享受快乐，永享幸福！

是为序。

莫文秀

2010年10月1日

目 录

慈善的力量 (自序)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慈善思想探析	1
第一节 古文化中“慈善”的含义	1
第二节 儒家的慈善思想	4
第三节 道家的慈善思想	9
第四节 佛家的慈善思想	12
第五节 墨家、法家的慈善思想	15
第六节 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的基本特征	18
第七节 认识与体会	22
第二章 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概况	27
第一节 古代慈善管理机构的设置	27
第二节 古代慈善活动的主要内容	38
第三节 古代慈善活动的基本主体	40
第四节 古代有代表性的慈善家	46
第五节 古代慈善事业的基本特征	53
第六节 思考与启示	57
第三章 中国近代慈善思想探析	63
第一节 清末时期的慈善思想	63
第二节 戊戌时期的公益思想	75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爱国慈善思想	83
第四节	近代慈善思想的基本特征	99
第五节	认识与体会	101
第四章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概况	104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慈善活动	105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慈善活动	110
第三节	教会在华兴办各种慈善事业	117
第四节	港澳台地区兴办的慈善事业	118
第五节	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特征	124
第六节	思考与启示	128
第五章	中国现代慈善思想探析	133
第一节	提出福利救济思想的新理念	133
第二节	形成社会福利的国家保障思路	143
第三节	恢复对慈善思想本质的正确认识	147
第四节	现代慈善公益思想的基本特征	159
第五节	认识与体会	161
第六章	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概况	164
第一节	开辟慈善事业发展的新道路	164
第二节	“左”的思潮损害慈善事业的发展	173
第三节	改革开放助推慈善事业的复兴	176
第四节	港澳台地区慈善事业繁荣发展	188
第六节	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主要特征	195
第七节	思考与启示	199
第七章	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公益观	203
第一节	形成现代慈善公益观的时代背景	204
第二节	对慈善公益概念的再认识	211
第三节	新型慈善公益观的理念特征	218

第四节 新型慈善公益观的功能定位	222
第五节 新型慈善公益观的主要内容	229
第六节 新型慈善公益观中的法制理念	239
第七节 思考与启示	245
附章一 当代西方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	248
第一节 民间主导型的美国模式	249
第二节 官民合作型的英国模式	254
第三节 非政府社团型的德国模式	261
第四节 志愿参与型的加拿大模式	268
第五节 官民互动型的澳大利亚模式	274
第六节 企业公益型的日本模式	281
第七节 思考与启示	289
附章二 当代中国的慈善组织模式	294
第一节 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性基金会	295
第二节 具有社会代表性的五大慈善公益组织	312
第三节 思考与启示	323
附章三 当代中国重大慈善救助实践	327
第一节 洪水大灾时的慈善救助实践	327
第二节 疫情大灾时的慈善救助实践	331
第三节 冰雪大灾时的慈善救助实践	334
第四节 地震大灾时的慈善救助实践	337
后 记	345

第一章

中国古代慈善思想探析

慈善之心是人之本性，也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在中华民族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各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从各自学说的角度，阐述了对慈善问题的认识。先哲关于慈善问题的观点汇入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慈善思想的传承与演变成为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重大变迁，古代传统慈善思想不仅培育出淳朴、善良、富于爱心的中华民族魂，而且为中华民族慈善思想的形成与丰富增添了绚丽风采。熊希龄先生指出：“吾国立国最古，文化最先，五千年来养成良善风俗者，莫不由于儒、释、道之学说所熏陶。”^① 翻看中国历史，早在先秦诸子百家时就对慈善问题有过不少的精辟论述，佛教、道教典籍中也有各种论说。虽然各种学派对慈善问题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在救人济世、扶危济困，以及人道理念、道德准则的认识上都是相通的。追根溯源，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的各种慈善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将有益于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慈善思想的精髓。

第一节 古文化中“慈善”的含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远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原始阶

①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下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页。

段，各氏族部落都是通过平等互助、团结协作来抗击各种生存风险的，对氏族内部老弱病残者的供养是每个成员的共同责任和义务，成为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当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社会慈善仁爱的风尚仍被后世传承，成为中华民族慈善事业发展的思想源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有关“慈善”的古汉字辞源解释有多种，其从分字解释到合一认识的渐变过程，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慈善”概念的深刻内涵。

一、“慈”的含义

古代文化对“慈”字的解释比较丰富：第一层含义是将“慈”直接表述为“爱”，“慈”就是“爱”的意思。如西汉刘向的《新术·道术》中云：“恻隐怜人谓之慈”，即见人遭遇不幸时心有不忍之意，这是有仁慈之心。唐朝训诂学家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中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曰：“慈谓爱之深也”，即慈善者的仁爱发自内心，他的恩泽遍布万物，慈是爱的最深层次。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道：“慈，爱也。”也表述出慈与爱的含义是相同的。第二层含义是将“慈”描述为长辈对晚辈的爱抚。如唐朝孟郊的《游子吟》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即用慈祥的母亲手里把着针线为将远游的孩子赶制新衣的情景，吟颂母亲对孩子慈爱的骨肉之情。春秋时期的国别史《国语·吴》中的“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管子·形势解》中的“慈者，父母之高行也”；《疏引·服虔》中的“上爱下曰慈”；《新书·道术》中的“亲爱利子谓之慈”等，都把长辈对晚辈的爱抚称为“慈”。第三层含义是子女对长辈的敬爱。如《国语》中云：“为义好学，慈孝父母”；《庄子·渔父》中云：“事亲则慈孝”等，都是要求子女做人要正义好学、尊孝父母。第四层含义是“慈”从家庭延展到社会。如佛家经卷中颂扬的“慈悲”、“慈恩”、“慈航”、“慈天”等字眼。这些对“慈”字的陈述，反映出古人质朴的博爱之情，不仅引申出子女尊重孝顺父母的内涵，又将其由狭义的父母之爱扩展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把“慈”与人性联系起来，为宗教传播注入了强大的社会活力。

二、“善”的含义

古代文化对“善”字的解释比较明确，即“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

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的高尚品行”。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善，吉也”，即认为一个人善良是吉利、喜庆的事。《庄子·大宗师》中写道：“善妖善老，善始善终”，其意就是善待小孩与老人，要始终如一、有始有终。《论语·子路》中云：“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是讲孔子告诉子贡如何识别好人，即只有好人都喜爱，坏人都讨厌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管仲的《管子·心术下》中说：“善气迎人，亲如兄弟”，就是表述用友善的态度欢迎人，犹如亲人一样。《国语·晋语》中讲：“善，德之建也”，认为有善风则可以建立起德政。《论语·述而》则认为：“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要选择别人善的方面向他学习，对照他不善的方面而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些典籍中的语句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开始提倡用“善”的标准衡量人的行为举止，高尚的品行逐步成为“善”字的重要内涵，善行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高尚行为的表现。

三、“慈善”为仁德与善行的统一

古代先贤经过对“慈”、“善”二字内涵的分别理解，又发展到统一的认识，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飞跃。到南北朝时期，“慈”与“善”则常常并列使用。两字的字义逐渐合一，包含了博爱为慈、乐举为善两层含义。唐代的李延寿在《北史》中称崔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是称赞崔光这个人待人接物时宽和仁慈，不触犯他人，无论顺利还是逆境，都能泰然处之。据现有史料来看，这可能是“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最早载录。韩非的《韩非子·内储》中写道：“王曰，慈惠，行善也”，即大王指出慈爱惠民，这是做善事。中国古代先哲认为，慈善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古人把作为人性理性认识的“慈”字与作为人性行为规范的“善”字合并使用，不仅提升了人们的人性仁爱理念，而且逐步转化为中华民族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使得中国古代慈善文明得以发萌。自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慈”、“善”二字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慈大悲”，即最崇高、最宽泛的慈爱与悲悯。佛学要典《大智度论》第二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就是说，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称

为“大慈”；使一切生命体脱离痛苦，称为“大悲”。这种解释与中国古代传统中对“慈善”的解释不仅毫无冲突，而且相互融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慈善关爱的道德观念自先秦出现后，从汉唐一直绵延于现代，彰显出中国古代极其深厚的以慈行善的道德民风。

第二节 儒家的慈善思想

从《礼记》、《周礼》有关我国礼仪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古代帝王在治理社会时已经设立出一定的慈善行为规范。从《周礼·秋官》记载中可以发现，早在成周之初时期，有的地方就设有“遗人、蜡氏”等职位，专司惠恤之政。“遗人”负责管理国家余财，以赏赐困济之民、老弱眷属和流离人群；“蜡氏”负责处理腐尸、掩埋路边死者。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专事慈善的人员。据《左传》记载，早在西周及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就实行“老有加惠”的恤老政策。当时的君主认为“老幼孤独不得其所”，即老人、幼儿和孤寡人得不到关照和安置是“大乱之道”和不施仁政的表现。《礼记》对先秦时代的养老惠政政策有所描述，即在都城中设官员专司“养疾之政”的机构，并将“养老”、“宽疾”作为保民养民的重要措施。《左传·文公十八年》中也多有记载救济灾民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古代早期发展出的恤老慈济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慈善理念，成为孔孟慈善思想体系生成的重要根基。

一、伦理核心之纲的仁爱理念

1. “仁爱”理念成为儒家伦理的核心

孔子（前551—前479）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文化主流之一。他将上古时代“尚仁爱、重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性归纳，提出了“仁者爱人”之说，并将其纳入道德情感和伦理规范，为构建古代慈善思想奠定了根基性的理论依据。他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仁”字在《论语》中曾出现了109次。《论语·颜渊》中记道：“樊

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以“爱人”释“仁”，将能“爱人”作为“仁”的本质。他提出的所谓“仁者，人也”，无疑是对中国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孝悌”是为仁之本，从孝敬父母的人伦道德引申出爱民守礼的善念和品质。他提出“忠恕”是个人为仁成圣之法，强调与人为善、乐善施人。孔子的名言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①意思就是说，一个有仁德的人，存心善良胸襟广阔，常思只要自己想自立，就会想到帮助别人自立，只要自己想通达，就会想到帮助别人也通达。能就近取自身做比喻，可以说这就是行仁的路径与方法。孔子在《大学》一文中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其中的“明德”和“至善”，讲使人善良的天赋美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必须要“仁爱”。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这些观点都是把“仁爱”看成是做人的责任和义务，倡导将心比心、与人为善的利他风尚。孔子向人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应以仁爱为价值原则，可以说对后人慈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仁政”理念成为儒家道德的价值观

孟子（约前 372—前 289）是战国时期的邹国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他进一步深化儒家慈善学说，在“仁爱”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主张。在《孟子·滕文公下》文中，孟子十分重视仁爱的社会意义，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与孔子的仁爱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他还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②孟子认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这“四心”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仁”的内涵已经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情感扩展为实施趋善的道德价值。他认为，恻隐之心，不但为行“仁政”之始，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基于“仁则荣，不仁则辱”的精神，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对于仁政措施，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举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

① 《论语·雍也》。

② 《孟子·离娄下》。

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即他对齐宣王说，贤明的国君制定产业政策，一定要让他们上能赡养父母，下能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衣足食，年成不好也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们走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孟子更多地注重仁爱的实践意义，他劝告齐宣王施行仁政，提出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导学生，头发斑白的人也就不会再操劳了。他认为老年人有丝绵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就能够使天下归顺于君主。孔孟学说从“仁爱”出发的慈善思想，为后人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内在的思想动力。

二、立国安邦之策的民本理念

先秦时期的儒家还没有明显的独尊皇权的思想，民本思想成为先秦儒家为政的核心理念。孔孟儒学的民本思想作为立国安邦之策，使得统治者能够妥善处理君民关系、护守社稷。在《孝经·圣治章》里，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他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生灵，其中以人最为尊贵。从而可以看出，至迟从春秋以来，张扬人的价值便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思想内容。其具体表现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倡导先人后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万物之中以人为贵；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以人性论为基础，推演出人际关系互动原则和君王治国之道。在《中庸》中记录了这么一段故事：齐国国君鲁哀公问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他的意思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施政都记载在竹简和木牍上面。当他们在位时，其政令就能施行，他们死了，其政令就湮灭了。孔子向鲁哀公进言：“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是说为政之道，在于施政的人，只有修身施仁政，才能够“修己以安百姓”^①，这反映出孔子的仁政方略同样浸透着“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则进一步明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荀子则指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③将民众放在第一位，更是古代民本主义的彻底流露。他们提醒统治者

① 《论语·宪问》。

② 《孟子·梁惠王上》。

③ 《荀子·王制》。

要以民为本，修仁政，关心体恤民疾，“惠民”才能“得天下”。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看，孔孟学说的民为邦本的思想，成为了历代王朝统治者实施种种惠民慈善政策的思想依据和治国手段。

三、天下为公之理的大同理念

1. “均贫富”的儒学慈善思想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三皇五帝时期是我国远古史中极其重要的阶段，许多有关政治和制度性的传说就发生在那个时期。东汉桓谭撰写的《新论》中说：“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霸）以权智。”三国魏诗人、文学家阮籍撰写的《通老论》中也说：“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开始从打破禅让制的“公天下”，转为建立王位世袭继承制的“家天下”，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孔子感叹自己出生晚，未赶上大道施行的“公天下”时机，也未见到三代英明之主，但是却十分向往天下为公的大道。他在《礼记·礼运·大同》里曾感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的想法是，在实施正道的时候，天下为人们所共有。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为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健康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财物不能遗弃在地上，获得者不会独自享用；憎恶那种在劳动中不肯出力的行为，而劳动不是为了私利。这样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不用闭户，这就是孔子勾画的“大同”社会。他在阐述社会大同思想时对弟子冉求和子路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①孔子针对春秋末期社会动荡和贫富分化，主张首先应当保持内部的稳定。他认为

^① 《论语·季氏》。

不论是治国还是管家，不应忧虑物质的匮乏而应忧虑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公，不应忧虑社会的贫穷而应忧虑社会的不安定，只要分配得公正就没有贫穷，社会和谐后就没有匮乏，安定了就不会垮台。这种均贫富观点已经含有救助贫饥者的慈善思想的萌芽，期待通过济贫困、助危困慈善活动等途径构筑大同社会。

2. “博爱为仁”的儒道革新思想

孔孟学说的慈善理念，从仁爱到仁术，形成了系统化的中国古代社会慈善思想，并开始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宣扬的慈善观点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具有慈善含义的宽政恤民政策为不同朝代所沿用。汉朝及以后朝代出现的一些儒教大家，更是站在“家天下”基石上阐述大一统天下时的儒道革新思想，宣扬“博爱为仁”的“大同”理念。例如，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政治家董仲舒（前179—前104），为适应汉武帝时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汇起来，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对此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在《武帝纪·赞》中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虽然他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对后世有极其巨大且有害的影响，但是他在《春秋繁露》中陈述的慈善惠政主张，提出在新的大一统朝代推行“存孤幼、矜寡独、养长老”等对社会弱势群体仁政关爱的慈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的。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韩愈（768—824）在《原道》中言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德。”大意是说博爱可以称得上仁，行动要讲究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具备这些条件便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将传统意义上狭义的“爱有等差”观念，扩展为广义基础上的“博爱为仁”思想，在宋代以后产生极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儒道革新思想的独特内涵。北宋的思想家、哲学家张载（1020—1077）提出学者应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他在《张子道统录》中提出仁政的首要之一是行“井田”，而井田的核心有八大纲领，即“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在《正蒙》中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表达出的“乾坤父母”、“民胞物与”的观点，将恤老慈幼看作是人们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